

结构性减税要打破利益集团阻碍

马涛

日前,中央会议要求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结构性减税已成为“稳增长”政策的重要抓手。笔者认为,结构性减税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加强政策力度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努力削减在进行结构性减税过程中面对的各种阻力,使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要让结构性减税顺利推进,必须妥善处理好各利益群体关系。

过往减税效果偏短期性

过去一段时间的结构减税政策,在经济全局和税收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结构性减税配合财政支出政策、货币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扩大内需、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促进产业协同发展、节能减排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结构性减税强调更深层地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而非表面地减少税收收入。减税之中有增税,包括不同税种之间的增减结构变化、同一税种内部的增减结构变

化。增税虽少,但调节目标明确:一是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针对房地产业。

但是,以往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效果都趋于短期性。减税对扩大投资的乘数效应较强,但促进消费的政策力度不够,对消费增长的作用只体现在居民对减税消费品的消费增加而不能刺激居民总消费支出的增加。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需求贡献偏低的需求结构、第二产业比重大而第三产业增长慢的产业结构和“双主体税制”的双主体税制结构都未得到显著改善。相比之下,虽然“稳增长”对于经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但是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则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变临时调整为长期税制改革

我国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既要注意解决眼前问题,也要注意长远发展,应将结构性减税的目标转移到经济结构优化上,政策内容也应由短期的临时政策调整转向长期的税制改革。通过

综合运用具有对策性、灵活性的临时性调控政策与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的制度性调控政策,把促进投资与消费、调节收入分配角度的减税与保证财政收入的增收相结合,根据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需要,在诸多行业、环节、产品中实行部分减税与部分增税,形成长短结合,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结合的税收调控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应从优化税制、规范税制的角度实施结构性减税,形成各种税收工具和税收要素科学分布、协调配合、功能完善的税收制度,将结构性减税作为税制改革的一项长期战略性选择。

一旦将结构性减税上升为一项长期制度改革,必然面对许多以前短期临时政策推出时所没有出现的阻力。毕竟改革不可能没有输家,很难具有纯粹的帕累托改进意义,税改必然会侵犯某些群体的利益。连续多年的税收收入快速增长,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已经形成了其利益来源的重要形式,他们要力求保住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没有社会创新的动力,缺乏创新的愿望。因此,结构性减税对既得利益集团没有吸引力,他们势必会阻碍收入分配的重新划分,阻碍税制改革目标向减税方向发展。

我国进入了一个制度僵滞的境地,权力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在减税时悄悄地搞增税。结构性减税更多涉及隐性税收,即所谓的“灰色地带”,包含税和费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大力主张结构性减税,推动“营改增”试点,提高小微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提高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等;另一方面,一系列普遍性的增税政策又悄然推出,如开征地方教育附加、税务代征工会经费、税务代征残疾人保障金等。这是因为减税具有了“曲线”效应,

譬如随着“营改增”推进速度加快,增值税抵扣的链条会进一步扩大,减税效果也会进一步显现,当期可能会带来税收收入的减少,造成政府收入的急速下降,这会触动各级政府的地方敏感神经,千方百计通过其他途径弥补减税损失。

确保宏观税负合理

面对地方政府减税的思想包袱,调整税制结构、推动税制改革就成为结构性减税的应有之义。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我国地方独立税种收入比重很小,共享税收入比重很大。在我国现行的28个税种中,虽然划归地方的税种较多,有18个,但这些地方税种大都是税源零星、征管难度高的小税种。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中小企业是很大的税源,这也造成地方政府对减税没有动力,中央希望减轻税负,但地方政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造成一边在减税、另一边又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费用的局面。

事实上,各级政府包括社会公众都应该明确结构性减税的目标。结构性减税做出有增有减的税制设计,主要是为了实现宏观税负的降低并总体稳定在一个合理区间,而不是税收收入绝对量的减少。这样的税负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外同等国家税负水平保持一致,以实现经济的活力和税收的竞争力,进一步规范国家的分配行为,并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税收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评论员)

■舆情时评 I First Response I

中华民族复兴 62% 是迂腐的数字迷恋

贾壮

上周末,一则有关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闻引来了极大关注,其热度甚至超过了羽球国手林丹的激情卫冕。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某学术论坛上发布研究报告,结论是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任务已经完成成62.74%。

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为实现这一梦想,中华民族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任谁是谁也想象不到,民族复兴居然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而且是精确到了万分之一!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我们拥有五千年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无不标示着中华民族曾经取得的辉煌成绩。近代中国国力日衰,民族饱受凌辱,在此背景之下才有民族复兴的理想和抱负,才有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

在不同的年代,民族复兴的含义不尽相同,民族独立、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都可以作为评判民族复兴的指标,但不是所有指标都可以量化,生硬套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给民族复兴赋予一个具体数值,实在是迂腐。

细看杨宜勇所长制定的指标体系,民族复兴指数也并非凭空创造。《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将复兴指数作为一级指标,选择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国际影响等六大指标为二级指标,最后将二级指标再分解,最终选择了29项三级指标,构成了中华民族复

兴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对比国家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可以发现,二者在指标设置方面比较相似,杨所长也承认,民族复兴指标体系确实受到了小康指标的启发,自己也是全面小康指标的专家顾问。

民族复兴指数只是为一套还算科学的指标体系起了个响亮的名字,以颇具政治意义的名字来概括经济研究成果,传播效果确实不错,但实际意义并不大,而且用生硬的数字解读民族复兴这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口号,容易将其庸俗化,丧失本身具有的激励作用。以杨所长的测算方法,不用多长时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将会达到100%,也就是民族复兴任务胜利完成,到那时,国人还要不要继续努力,去创造更大的繁荣呢?

对民族复兴指数的一种质疑是其研究华而不实,滥用学术经费,杨宜勇回应该项研究纯属个人兴趣,前后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使用国家一分钱。不过,只凭个人兴趣的研究还是希望能对决策有所影响,据他介绍,2005年的测算结果是46%,将数字向高层汇报时,得到的反馈是低了,今年尚未向高层汇报,目前未受到官方层面的反馈。如此重视与高层的互动,不能不让人怀疑其研究是否能够做到理性客观。

也许杨宜勇所长真是怀揣助力社会进步的远大抱负,希望自己凭借专长所做研究能够发挥一些作用,没有负面影响的兴趣爱好应当鼓励,这本无可厚非。只是希望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少一些不靠谱的数字迷恋,少一些吹捧盛世的媚上色彩。或许,这样离中华民族的复兴真的就更近了。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东部率先复苏为下半年经济涂上亮色

陈伟

截至8月1日,全国30个省市公布了上半年经济增速。从地区增速排行榜上可以看出,虽然中西部地区增速仍靠前,但是若从纵向时间分析,却发现今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速表现反而更加稳定,且大多数今年以来已经率先呈现经济回稳的态势,而由于它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一半以上,这很可能意味着不必对于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过于悲观。

除天津外,经济增速排名处于第一梯队的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在前10名的省份中一举占据6席,如增速较快的有重庆、贵州、甘肃、四川、陕西、青海,它们分别为14%、14%、13.6%、13%、13%、12.3%。经济增速居中的主要是中部地区,这一方面得益于这些地区受益于国家振兴中部地区的一系列举措,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受益于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大规模开展的产业转移。经济增速排名靠后的主要是东部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GDP增速都位居后列,分别为7.2%、7.2%、7.4%、7.4%,这反映出这些地区在步入工业化后期,人均GDP也

已超过国际上收入水平之后,经济增速自然下行的经济规律。

尽管东部地区经济增速排名垫底,但是今年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却更早出现企稳态势,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上半年增速分别比一季度提高0.2、0.2、0.4、0.30、0.1个百分点,这与2009年那一轮的经济复苏完全不同,当时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速企稳相比全国其他地区更为滞后。我们认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速领先全国企稳回升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与2009年同期出口大幅度下滑相比,今年以来虽然出口增速仍比较低,但却呈现企稳回升的态势,同比累积增速从1-2月的6.84%上升至上半年的9.19%,支撑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速稳定。

第二,今年以来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速更早出现企稳,如东部地区今年5月投资增速就有企稳的迹象,1-5月投资增速为19.3%,比1-4月提高0.5个百分点,而中西部的投资增速还在下滑。首先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程度较小,如上半年东部地区房地

产投资增速为15.4%,仅比一季度减少5.2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降幅为8.8和10.6个百分点。这可能说明东部地区人口聚集程度较高,人们对财富积累水平也较高,因此也能更快地刺激地产复苏。其次东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增速也比中西部恢复较快,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大多数企业处在产业链的中下游,因此在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回落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动力也就更容易更早恢复;东部地区的工业投资更着重于精密制造及产业升级,而这也更多获得政策支持。

第三,从产业来看,东部地区的发展也更为稳定,如第二产业方面,今年以来东部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更为稳定,如全国排名靠前的东部地区自年初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都已企稳,其中,广东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增速为7%,比1-2月提高2个百分点,江苏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增速比1-2月提高1.2个百分点,这与它们先进制造业占比提高较大有关,而在当前我国加快刺激产业升级的时期,这些产业发展也比较快,如上半年新兴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速是12.3%,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长高1.8个百分点;此外,东

部地区服务业也普遍较为发达,占GDP比例较高,而今年以来,第三产业增速率先出现了企稳回升,上半年增速从一季度的7.5%回升至7.7%。

展望下半年,东部地区GDP增速还将保持稳步回升的态势,并很可能继续引领全国经济复苏。在当前大规模总量经济刺激难以成行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刺激将更多具有结构性特征,且更多注意激发市场发展活力,如产业升级将会得到更多的扶持,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将会更大规模地实施,民间投资将会在政策鼓励下获得更多刺激等,而这都是有利于市场化程度较高、产业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会落后,在下半年政策刺激中西部崛起战略的引领下,中西部依靠自身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期的强大增长动能以及更多的政策支持,经济增速仍将继续领跑全国,并有望在经济环境改善情况下,如资金更为充裕,土地市场复苏,大宗商品价格趋于稳定等,逐渐企稳回升。而这两大地区经济的同步回升也让我们对于下半年全国经济增速回升具有更多的期待。

(作者单位:民族证券)

煤价暴跌根源: 周期规律战胜反周期力量

黄光锐

近来,环渤海各港口动力煤市场出现均价10周连续下跌,其中有4周的单周跌幅在20元/吨以上。随着煤价连续深度调整,从北到南各路煤炭贸易商如临深渊,十年来一直“坐家里点钞票”的鄂尔多斯煤老板们也破天荒地坐不住了……

煤炭的生产过剩危机

同任何成规模的经济现象一样,大幅下调的煤价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不过笔者还是试图用一个尽可能简洁明了的框架来加以解释。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的长周期、经济政策的反周期行为为供需两侧的外来触发因素这三条,乃是近期煤价大跌的关键所在,也是解读未来煤价走势与决策煤炭市场操作的紧要之处。

作为大宗商品,动力煤价格取决于供需状况,这是表面的情况,在经济增速放缓、电力需求不足、煤炭价格下滑的背后,在一轮行市波动的背后,经济周期在起着作用。

坦率地讲,经济周期从统计规律上看是客观存在的:自从1825年7月英国爆发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以来,这种经济危机已成为挥之不去的魔咒。作为一个客观规律,只要不干涉重大的结构性转变,“长周期”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不失为一个选项。

然则,经济周期在很多时候也批判“资本主义腐朽本质”的批判而被许多人不遗余力地掩盖了。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应该说,在最初的十余年里,中国经济是在为过去的短缺落后补课;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转型阶段。因此,在持续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的中国经济中周期波动被掩盖了。但到了中国GDP规模扩张到了全球第二大时,仍旧认为中国是个刀枪不入金刚不坏的经济体,可以对周期率产生免疫,那就非但是自大,而且是一种危险的盲目。

看看从沿海港口到煤炭产区、从电厂仓库到车站码头堆积如山的存煤量,就应当意识到这是一场经典的生产过剩危机。再看着各地高企的住宅空置率和纷纷“检修”的钢厂高炉以及阴霾不散的欧债危机和低迷不振的美国经济,就会让人产生中国经济这一轮“长周期”是否已进入尾声的担忧,甚至让人担忧是危机首次降临中国的前奏。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耗的70%,其需求变化是比石油更为可靠的经济晴雨表。

“黄金十年”透支长期经济潜力

周期率一旦起作用,其效果是非常残酷的,只要看看1929年那次大危机的后果就知道了。不过,很多声音会说这样的观点是危言耸听,而且这些声音还会强调中国经济与典型的西方经济不同,中国在政府主导下能够实施持续高速增长。那么这种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以打破周期率的魔咒呢?

从人均GDP和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似乎只有到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之后,才值得讨论长周期是否结束的问题。然而长周期潜力的持续发挥,应以结构性矛盾被排除,货币财政收支等公共政策保持平衡为前提。如同物理学不提供永动机一样,经济学里也没有无限的长周期。

明智的经济政策应当是未雨绸缪,通过建立公平合理并且奖励高效回报创新的法律政策环境促进增长,并在增长中以各种调控措施维护结构平衡,从而创造良性循环机制,使经济周期得以最大限度延长。数十年一遇的“人口红利”、数百年一遇的城市化和可遇不可求的全球化三大有利因素的重合,

在正常状况下,中国经济应当有长达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战略机遇期,而不仅仅是“黄金十年”。

然而,在“流动性盛宴”之下,十年来各级政府推出的经济政策许多是自相矛盾的。其中的大规模反周期行为从细节上看是极为“丰富”的,但观其大略,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01年至2008年,主要是房地产大干快上和房价地价疯狂上涨。这种只求短期利益不计长期后果的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直接后果便是提前透支了长周期提供的经济增长空间。房价高涨的“黑洞效应”大大压缩了国内普通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直接导致内需型经济难以启动。过去十年里,中国出了一大批房地产亿万富翁,大马路大广场及政府办公大楼也比比皆是,却居然没有出一个世界级的时装设计大师,没有一个世界级的时尚品牌,没有一个世界级的个人IT产品品牌,坐拥数以亿计人口的消费市场却只是跟在LV和苹果手机后面“望星”。

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模式,人为地把一个非常理想的经济周期大幅缩短了,原本可以轻松达到二三十年的长周期增长就这样被透支成了“黄金十年”。在北京奥运会的焰火落下之际,次贷危机的爆发给人们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庆贺,而是出口市场急剧萎缩的忧虑。国内的增长周期被提前透支,欧美又不争气地提前跌下了,内需和出口一个迟迟上不了场一个却已明显减速,看来维持高增长的唯一选择就是扩大基建投资了。

反周期政策扭曲价格信号

2009年初“四万亿计划”的推出标志着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反周期经济政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试图人为地把已被透支的经济周期强行拉长。

在反周期刺激政策下,天量货币供应首先就反映到基础商品价格上。中国未能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技术密集的科技发展型转变,相反却走向了高能耗的资源密集型发展。而一转变直接导致煤炭、铁矿等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大牛市。进入2010年,随着各地“保增长”项目雨后春笋般上马,钢材水泥等各类建材供不应求,社会用电量也跟着节节攀升。货币超发“高效率”地转递到了煤价上。即便在全球经济明显过热的2008年长江口标煤价也不过0.1元/公斤,在“四万亿刺激”启动后迅速从低位向上突破0.1元大关,至此轮暴跌前甚至0.15元的高价也不罕见。

反周期的“刺激计划”释放了扭曲的价格信号,一时间,不要中国人,甚至很多国外生产商也认为强行拉长经济周期是可以奏效的。在亢奋的气氛下,必和必拓总裁埃德蒙公开预期中国钢产量将达到惊人的11亿吨。在国内这边,煤炭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煤炭行业完成投资1.25万亿元,接着在2011年又完成了47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正是这些新增产能的巨量释放,造就了今天从渤海一直堆到南海的座座煤山。

然而,如同物理世界无所不在的重力场一般,经济周期的客观规律是无法强行扭转的。“四万亿刺激”实行了不过两三年,严重的通胀威胁迫使央行一再收紧银根,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也迫使基建扩张步伐不得不放缓,再加上一直“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的房地产市场,经济减速成为必然。就这样,一面是供应产能的集中上市,一面是有效需求的骤然收缩,“四万亿刺激计划”成了一个大大泡汤,一下子被套牢了全球矿企,也套牢了众多财雄势大的煤老板和贸易商。

(作者系煤炭贸易行业人士)

焦点评论



赵乃育/漫画